

·建馆110周年纪念之事业篇·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的 后期(1945-1951)事业与终结

——以国家图书馆档案为中心

刘 鹏

内容摘要: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特殊背景下,共同成立的以征集、保存、整理中日战事史料为主要工作的学术组织。抗战胜利后,这一组织先后成为北平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的内设机构,继续存在。但因为时局变化、经费不足和人员短缺,尤其是抗战主题热度的消退,这一机构在经历了1945年至1947年的复员与北返、1947年至1949年的恢复与停顿,1949年至1951年的维持与隐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51年11月正式结束。数十份国家图书馆档案记录了这一历史。

关键词: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 后期事业 国家图书馆档案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甲方)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乙方)^①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特殊背景下,共同成立的以征集、保存、整理中日战事史料为主要工作的学术组织。其中平馆负责史料的征集和保存,联大负责史料的编辑与整理。史料会下设委员会,由平馆馆长袁同礼、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分任正副主席,刘崇鋮、姚从吾、钱端升(以上代表联大)、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以上代表平馆)任委员^②。总编辑姚从吾、副总编辑刘崇鋮之

①本文中,“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多省称“史料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多省称“西南联大”或“联大”,“国立北平图书馆”多省称“平馆”,“北京图书馆”多省称“北图”。

②1939年1月1日史料会成立时,委员名单如此。1940年6月由史料会出版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集刊》增列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为委员。至1942年11月13日,因刘崇鋮“久未返校”,联大议决以雷海宗补为委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

外,编辑尚有郑天挺、钱穆(以上中文)、张荫麟、叶公超、雷海宗、蔡文侯、丁佑、皮名举、伍启元(以上英文)、邵循正、吴达元(以上法文)、冯文潜、冯承植(以上德文)、刘泽荣(以上俄文)、王信忠、傅恩龄(以上日文),可谓极一时之选。当然,上列委员及编辑,相当一部分不过列名其中。一方面,史料会得以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有助于争取经费和支持;另一方面,学者们或者亦可藉以查阅稀见史料,并获得有限的津贴。较多参与会务的学者,除姚从吾外,尚有冯友兰、刘崇鋈、刘泽荣、张荫麟、王信忠、傅恩龄等人。史料会既是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密切而微妙关系的完整缩影^①,又是抗战前后层出不穷的战事史料征辑活动^②的最佳代表,颇值得仔细探究^③。

①仔细对比1937年9月《长沙临时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图书馆办法草案》和1938年12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办法》,可以看出双方的合作在权责基本平等的前提下实现,且经费由双方平摊,职员薪水各自支付,所购书籍均各立账簿,类似“亲兄弟明算账”。联大作为甲方,承担稍多的责任(如负担办公费、场所乃至家具、纸张),似乎话语权稍大,但合组之图书馆及史料会均推乙方代表袁同礼为馆长及主席,又体现出一种尊重,从而较好地维持了合作互利的平衡局面。

②抗战军兴,征集、保存战事史料,为当时社会各界高贤之共识。政界如行政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教育部、国民参政会,甚至蒋介石个人;学界如西北联大、武汉大学、抗战史料编辑社都曾有函电征辑之举。取代平馆成为“国家图书馆”之中央图书馆,对战事史料征辑,亦颇注意。但其中善始善终、成绩最著者,当推史料会。王勇则《碧血英魂:天津市忠烈祠抗日烈士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91-736页)一书对此有详尽梳理。另可参考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国民参政会决议案实施情形一览》,1939年,第139页;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309-313页、第421-424页、第440页;章以鼎:《“国立中央图书馆”六十年大事记初稿(1933-1992)》,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3年,第10-13页。

③关于史料会,较为重要的回忆文字或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著有:吴文浩:《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初探》,《抗战史料研究》,2016年,第1辑,第66-75页。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第八章第一节《编纂中日战事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37-352页。戚志芬:《袁同礼先生与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北京图书馆通讯》1989年第1期,第58-62页。戚志芬:《战火中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百年潮》2011年第3期,第75-77页。李晓明、李娟:《袁同礼与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袁同礼纪念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35-144页。李娟:《一批珍贵的抗战文献——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藏书发现始末记》,《国家图书馆第十次科学讨论会获奖论文选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1-29页。钱存训:《抗日战争沦陷区史料拾零》,《钱存训文集》第三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32-237页。高柯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与云南地方政府》,《国图与抗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图书馆员工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7-35页。赵其康:《北京图书馆变迁纪略》,《文史资料选编》第32辑,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267-273页。

由于文献的缺乏,学界对于史料会的后期情形,十分陌生。涉及西南联大的论著,虽多对史料会有所涉及,但往往以为或暗示该会在抗战胜利后甚至战时即告结束^①。即使曾在史料会工作三年的戚志芬女士(1919—2013),虽然在文章中提及战后史料会文献北返及在平展览之事,却也认为“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史料会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西南联大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史料会也与西南联大相始终”^②。2015年以来,笔者与高柯立、梁葆莉、邱奉捷、王天乐等同事,查阅国家图书馆藏电子扫描档^③万余页,并参考西南联大档案、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及其他公开出版物,对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的会务档案、报道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较为细致地考索与研究^④。其中最大的收获,当属史料会后期会务档案的发现^⑤。这部分档案,涉及史料会在战后的维持与消歇,为前人所未见、所未言,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史料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文将以战后复员和政权的更替为界限,围绕这批档案,对1945—1951年史料会的情形、人员和成绩,分三个时段加以考述,并对其结束运作的原因加以讨论。

①如对西南联大卓有研究的易社强(John Israel)先生即云:“‘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主要成员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在姚从吾的指导下开始运作了。姚从吾的团队收集并翻译日本图书报刊,但在1940年夏天日本占领河内之后,资料就此断绝,这项计划也因此寿终正寝。”(《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这段叙述中,除了对史料会的结束时间和原因(据探访孙毓棠所记)记载不确外,还有几处问题需要澄清:1.史料会的全称当为“中日战事(而非‘战争’)史料征辑会”。2.史料会成员除了联大文学、历史、政治系教授(委员、编辑),还有历史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及北平图书馆馆员(工作人员)。3.战时史料会所收集的文献(书籍、报刊、小册子等等),以中文为主,日文书、报、刊因渠道不畅及互为敌国等原因,为数不多。4.史料会的日文书籍,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平馆上海办事处征购(通过租界书店及日本内山书店),之后直寄昆明或通过香港周转(直至1941年香港沦陷始告结束)。

②戚志芬:《战火中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1909—200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6页)承袭了这一说法,称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同时结束”。

③“国家图书馆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目前仅对内部开放档案目录,经申请并审批后,可以查阅原档案的电子扫描版本。本文所据电子档名、电子档号均源自该系统。国图档案各宗中多包含多个文档,跨越若干年,故档案号中的时间标识常常与文档时间不能完全对应。特此说明。

④史料会会务史料将力争于年内出版。

⑤国图档案中关于史料会的集中档案有两份,分别为“本馆与西南联大合组征辑中日战争史料事(国图档,1939-※054-综合2-001)”、“集中保管原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资料文件(国图档,1950-&406-039-5)”。其余内容,散见于另外数十份档案中。

一、1945年8月至1947年春：归燕碣，还故都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获得胜利，北平图书馆和西南联大均开始筹备复员。但是，由于时局等复杂原因^①，联大于1946年5月^②开始北返，而史料会文献直至1947年夏始基本运回北平，因之这一阶段史料会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搬迁和复建。

(一)

1945年11月7日，联大第三五二次常委会议研究了史料会文献的回迁事项，决定应平馆之请，将存于联大陈列之西文书刊及史料会资料，在联大复员时与其他设备同时运平，并由平馆分任部分运费^③。1946年1月23日，联大第三六一次常委会议议决了将史料会移交平馆“接收办理”的条件：

(1) 北平图书馆应继续进行征辑中日战事史料工作。

(2) 会中所已收集之史料及北平图书馆继续收集之史料，均应由北平图书馆专设一部门保管整理。

(3)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同人如有研究工作需用参考有关中日战事史料时，北平图书馆应尽量予以便利。

(4) 关于征辑保管及整理中日战事史料，北平图书馆如需要三校协助时，三校当本原有合作精神，于可能范围内予以协助。^④

这份决议非常值得注意，它虽然暂时搁置了史料会征辑资料的产权问题，但实际上已将其托付与平馆，联大（这时明确为三校）已经淡出，仅作为协作者、利用者而存在。这份决议的精神，也成为1950年北图与北大、清华商讨结束史料会条件的重要依据（具体分析详后）。随后，1946年2月13日联大第八

①“1945年9月2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商讨后方学校如何迁移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致‘训词’，提出各校不要匆忙搬移，‘准备愈充足愈好，归去愈迟愈好，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学校也不应亟亟于回去。’根据这一精神，联大常委会仍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工作。一方面稳定师生情绪，继续上课，一方面分别向三校打招呼，希望尽快做好北迁的准备工作。远途迁校，是一项浩繁艰巨的工程，涉及北方校舍的接收修缮、师生迁移、物资输送、联大校产的分配处理、复员费用的申领、交通工具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1947年7月中，最后一批北迁物品到达。”（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7—318页，第321页）

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350页。

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401页。

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413页。

届八次校务会议通报此事^①,至20日,联大收到平馆同意移交条件的复函^②。

那么,为什么联大和平馆决定在此时提出这一决议呢?

第一,玩味决议文意,“联大”字眼不复存在,代之以“三校”,已经暗示了时移事异之意:联大即将结束,联大与平馆的“合组”,从名义上而言,也应自然结束。以这一点而言,戚志芬女士说“史料会也与西南联大相始终”,自有其道理。那么,联大结束后,平馆与三校继续合组史料会,是否可行?事实上很难实现。南开复校后,京津悬隔,自不便再参与会务,事实上战后的史料会会务文献中,南开已无存在感。即使同在北平的北大与清华,校务自理,财产、图书、仪器也须分割清楚,这也给“合组”带来了困难,毕竟三校与平馆都是独立建制的机构。参照平馆的类似做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决议。1937年9月,由南下之袁同礼率领,寥寥数人的“北平图书馆”与长沙临时大学合组图书馆,袁同礼任馆长,直属临大常委会,其一同迁滇。然而,就在史料会即将成立的1938年12月,袁同礼却以平馆迁滇后“事务纷纭,对本校图书馆事宜不能兼顾”,请辞联大图书馆馆长,并将大部分职员自联大图书馆调回。对此,联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予以理解并接受,还提议两馆继续合作^③。然而事实上,联大图书馆很快“降格”,归属教务处,并改馆长为主任^④,由联大职员并与平馆渊源颇深的严文郁接任。但是,合组图书馆的结束,并未影响双方的其他合作(如随后合组的史料会),更无损于双方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由特殊回归常态的行为。

第二,“合组”本是权宜之计,战事的结束,也使得双方合组的背景不复存在。抗战期间,万事皆难。联大(临大)与平馆,不论是合组图书馆,亦或是合组史料会,除双方早在北平时即有融洽之关系,密切之合作外,更出于这两股相较于中央大学和中央图书馆的“非嫡系”文化力量“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需要:南下之袁同礼方面,缺钱、乏人^⑤、有书(西文杂志由寄北平改寄长沙、昆明)、有渠道(有北平本部及上海、香港办事处的支持);而联大(临大)方

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512页。

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421页。

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77页。

④据《西南联大图书馆概况》称:“是时袁同礼先生因在香港工作繁忙,不能兼任本校职务。袁先生辞职后,图书馆组织范围缩小,改馆长制为主任制,隶属教务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经费、校舍、设备卷》,第287页)

⑤因为平馆的出资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基会)并不认同1937年8月袁同礼及部分馆员的南下行为,而力主维持北平馆务,双方发生矛盾,袁同礼所能直接掌控的经费和人员,都颇为不足。

面,有钱^①、有人、乏书(“成立之初,三校旧有图书均未及运到,图书设备亟待充实”^②)、少渠道(许多书、报、刊均需通过平馆上海办事处代购代邮),现实困难和优势互补,直接促成双方的合作。而抗战结束后,时局缓解,尤其得以北还复馆(校),人、财、物的短缺已经或即将得到极大缓解,可以独立发展,是以合组之必要性亦因之大大降低。

总之,“合组”变成“合作”,“抱团”转成“独立”,可以概括这份关于史料会的决议的核心精神。

(二)

联大决议既定基调,史料会文献亦开始编目、清点并装箱。1946年4月15日,姚从吾致函陈垣云:“生半年来忙于结束工作,大部分时间费于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西南联大史学系与北平图书馆廿七年合组者)。已得材料(内分日报千余种,期刊千种,抗战书籍数千册,约可装一百五十大箱)之编目、装订、装箱等事,故疏于问候,敬乞赐谅!”^③5月10日,联大开始向平津迁移。6月9日,姚从吾致函朱家骅,云史料会于本周正式结束,收集之资料从1938年起至1946年6月止,“共得日报、期刊、小册子、文件等,一百六十八箱^④(三分之二为大木箱,余为中号箱),历时九年,幸未一日中断”,并已点交平馆接收^⑤。7月16日,平馆主持史料会文献迁运事宜的万斯年^⑥致函范腾端云:

九翁先生道鉴:

违教为念!近维起居迪吉为颂。现史料会装箱迁移,大抵完毕,用款之处无多,前借尊处之款八万元,兹暂奉还四万元,已通知孙闻真君于台驾领薪之际奉上,庶免往返之劳。该八万元款内,计曾拨付孙闻真处一万七千元,则史料会所用不过二万馀元也。教部补助费尚未到,到时当可全数奉还也。装箱事,已否着手?需用周汝华帮忙不?惟其人只能帮忙较粗之事,不能写录、记录耳。专此 敬颂

撰绥

晚 万斯年 白

①临大开办之初,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即允补助开办费25万元,中基会补助10万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8页)。

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经费、校舍、设备卷》,第286页。

③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66页。

④据1948年6月《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概况》(电子档名:本馆与西南联大合组征辑中日战争史料事,1939-※054-综合2-001),迁平资料为一百七十箱,想稍后又略有补充。

⑤转引自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第347页。

⑥据“北平图书馆民主评定职工薪级自报书(式一)(国图藏电子档:1949-&255-027-4-1-006)”中万斯年自述,其于“抗战胜利后,则曾主持史料会书籍文献整理迁运事宜”。

据万信,史料会所费两万余元,当为半年来打包、集中、装箱之用^②,而不可能是北迁费用——此时的两万元,也就够买100斤大米或40斤面粉或20斤猪肉之用^③。戚志芬亦称:“(1946年)6月,我也随学校北返,回到北平图书馆。史料会的图书资料托运是和西南联大的图书仪器一起由昆明起运抵平津的,到1947年夏始陆续运回平馆。当时这些史料存北海静心斋,派专人管理,并继续征集。”^④这番描述,与1945年11月7日联大第三五二次常委会议关于文献北迁的决议一致。

联大复员之际,原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建校,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联大将数千册书籍移赠昆明师范,其中即有部分史料会藏书^⑤。

就在史料会图籍迟迟未能北运之时,与北平图书馆一墙之隔的北海公园,已经悬榻以待,主动迎接这些八年来辛苦征辑、精心保存的记录我中华民族苦难与斗争历史的文献。1946年5月8日,北海公园委员会致函平馆,“拟请贵馆在该处设立分馆一处,陈列图书或关于抗战资料之书报,以供游人参阅,俾免废弛等”。5月11日,负责平馆留守馆务的顾子刚、王访渔,复函同意先将“样子雷”模型在北海公园辟一展览室开放阅览,此外申明“惟敝馆复员伊始,本年经常费及职员人数均无多,颇感不敷分配。而抗战资料之书报,大部尚在渝、昆各地,未及运回;在本市陆续征集者,为数甚少,

①电子档名:北平图书馆疏散图书事(国图档,1946-※039-采藏11-005)。今按:据1946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渝昆两部分职员录》(国图藏电子档:1946-※013-人事2-001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表[驻外办事处]1946),范腾端字九峰,时年53岁,万斯年时年39岁,故有“九翁”之尊称。

②1940年以后,史料会为避免敌机轰炸,文献散存于昆明大西门外地坛(史料会会址)、东门外陶园村起凤庵、城北龙头村附近的宝台山等地。参魏明经《我与徐旭先生的三十五年联系》(毛德富:《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教育卷》卷三《民族宗教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34页、第1136页)、高柯立《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与云南地方政府》二文。

③1946年11月,昆明物价为:1市斗米价2542元,1斤面粉590元,1斤猪肉1068元(万奎一:《民国时期昆明的物价》,《五华文史》第13辑,政协昆明市五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年,第210页)。

④戚志芬:《战火中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

⑤蒋金和王顺英:《西南联大藏书印研究》,《图书馆学刊》2017年第6期,第124页。该文云:“如此紧张的经费条件下,联大还购入了大量抗战类书籍,这为后方抗战提供了思想源泉。现存的500余本抗战类书籍,其中百余本标有‘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和印刷体‘抗’及手写体‘抗’等字。”

不足以资陈列”^①。

那么,从1946年6月文献装箱至1947年夏运平的一年间,史料会的工作是否处于停滞状态呢?虽文献无征,笔者却怀疑并非如此——至少在平馆方面,征集工作仍在进行。早在1946年3月2日,南京办事处负责人顾斗南即致函上海办事处鬻汝僖(颂声),称“京中旧书肆,颇多抗战史料,如欲及时选购,请裁示”^②。而且,“在宁、沪、杭搜集敌伪时期之刊物(史料),为数甚夥。数年之间,共寄出一千馀包”^③。此外,平馆在1945年12月奉北平行辕之命,接管了伪公务总署藏书19582册,其中“关于敌伪资料部分,已送交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④。战后移交史料会者,尚有日本图书保存会千馀册日文书籍(详后文)。

需要说明的是,史料会的灵魂人物姚从吾在随联大复员后,于1946年12月出任河南大学校长^⑤,三校教授也不再参与会中工作。因此,作为史料会征集、编辑两翼之一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已基本宣告结束。

二、1947年春至1949年2月:心难静,侨亦孤

1947年春,史料会文献全部抵平,存放于北海公园静心斋内。这座北海北面的园中之园,台榭纷然,美不胜收,自非困顿拮据、空袭频繁的昆明可比,史料会的工作,似乎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然而,时局的动荡,经费的短缺,尤其是看似隐微却影响久远的抗战主题热度的消退,让史料会在1947年夏至1949年2月平馆被接管这一段时间内,在清冷和遗忘中,度过危局。

(一)

史料会于静心斋恢复工作后,“工作人员暂由本馆及北大、清华各派员参

①电子档名:关于在北海分馆陈列图书事(国图档,1946-※055-综合3-001)。

②电子档名:顾斗南的信(国图档,1946-※046-外事5-004)。

③电子档名:1949年北京图书馆南京分馆业务概况及工作计划(国图档,1949-&012-004-1-1-001)。

④电子档名:接收敌伪书籍事;中文采访股接管敌伪书籍的报告(国图档,1949-&382-039-2-(2)-21-002)。报告未署年月,据档号及文中所涉日期、称谓,当成文于1949年初。据1949年6月“北平图书馆民主评定职工薪级自报书(式一)(国图藏电子档:1949-&255-027-4-1-006)”中陆元烈自述其工作云:“本馆开馆迄今将近二十年,杂志、日报散置各处,零乱不堪,从无人加以整理。元烈自接管以来,领导清理积存杂志及日报,因库房容量不足,将敌伪期刊及日报移存北海静心斋。”何韵秋自述云:“我曾很辛勤地整理敌伪报纸,移送静心斋。”赵炳璋自述云:“本人于36年8月调在中文期刊工作,除每日供给阅览人参考杂志收发外,已整理敌伪时期出版之各种公报期刊共十一大箱,全数拨交中日抗战史料研究会。”

⑤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第127页。

加”^①，仍延续了合组时期的固有形式。1946年至1950年由清华派在史料会工作的郭吾真，曾有如下回忆：

1946年，南迁各院校复员北还，我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在系主任雷海宗教授的安排下，一部分时间用于为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一部分时间用于参与“抗日战争时期史料征辑”的工作。对我的影响，则以后者比较深刻。

“史料征辑”工作由清华、北大、北京图书馆共同负责，各派一人共襄其事。史料主要由北图管理，集中于北海的静心斋，其来源则是西南联大时期所藏各种正反文献之北运者。其中有关于抗战的书刊，也有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马列主义和许多进步专著。工作实际处于无人过问状态。而北大、北图的两位同志却都很进步，并且放言无忌。所以，只要三人聚集一处，我都可获得不少革命理论知识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革命斗争信息。我还尽可能自由阅读那里所收的禁书，不知不觉间相对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在1948年12月中旬清华获得解放之后，我欣然参加了一个时期对党的城市政策的学习，为迎接北平城的解放作思想准备。1949年元旦前夕，参加了平生第一次充满革命欢乐气氛的庆祝晚会。^②

郭吾真的回忆印证了史料会当时的工作，仍由平馆、北大、清华共同参与。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会中人员仅有区区四人（平馆关振泽^③、任延

①电子档名：194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国图档，1948-※010-年录6-001）。今按：据原档，《概况》成文于1948年3月。

②郭吾真：《平凡的历程》，《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1989年第3辑（总第64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第105页。郭吾真（1909-2009），女，山西榆次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解放初在北京图书馆工作，1951年调往山西大学，曾任山西省妇联常委、山西省政协常委。《平凡的历程》一文相当于她的自传。

③据“公务员平时成绩考核记录表说明（国图档，1947-※017-人事6-005）”及“北平图书馆民主评定职工薪级自报书（式一）（国图档，1949-※255-027-4-1-006）”，约1947年7月至约1949年7月负责史料会工作的关振泽（1917.9.16-？），河北宛平籍，满族，可能出身于军人家庭，毕业于辅仁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5年12月到馆，先后任职于编目组、阅览组、皮藏组、史料会，月薪100元（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平馆1947年度两次雇员考成（1947年7月、1948年1月），关振泽操行“稳练笃实”“稳妥”，学识“优良”“充裕”，两次均列次优，获得嘉奖。

熙^①,清华郭吾真,北大不详),且“工作实际处于无人过问状态”。

郭吾真的回忆直白而令人惊讶,史料会何以在烽火中可以征辑不辍,在宁静美丽的北海之畔工作却“无人过问”?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和抗战时期一样归结为时局动荡和经费短缺外,还有抗战主题热度的消退。

先说时局之动荡。1947年夏,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飞涨和国统区经济的崩溃。至1948年底,北平被围,清华解放,在这种朝不保夕、米珠薪桂的时局之下,静心斋中人,还能否静心工作?

再说经费之短缺。平馆经费,战前主要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馀款支付,充裕且稳定。全面抗战爆发后,或因中基会反对馆务南迁,或因中美签订新约致庚款停付,平馆已逐渐丧失这一主要财源,而转赖教育部拨款,战后更确立了这一形式^②。但实际上,从抗战爆发至1949年解放,在通货膨胀剧烈的背景下,教育部对于平馆的拨款,始终严重不足,尤其是与后起的中央图书馆相比,有云泥之别^③。

1947年11月18日,史料会呈文教育部,请求照战时成例,按月续拨已停发年馀的专款。其呈文叙述复员以来窘境及未来计划云:

案查本会于廿八年在昆明正式成立,当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其他文化机关合组一委员会主持会务,当蒙大部按月拨给专款,以维持会务。其不足之数,则由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分摊,历经具领在案。自卅五年复员后,此项专款大部暂予停发,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亦以款绌无力兼顾,北平图书馆更难独立支持,因是本会遂尔停顿,只能将已搜集之资料派员保管,无法继续进行。伏念此次

① 据“北平图书馆民主评定职工薪级自报书(式一)(国图档,1949-※255-027-4-1-006)”、北图人事分配情况及1950年增加人员的情况说明(国图档,1949-※251-027-2-1-035),任延熙(1906.8.4-?),河北武邑人,高小文化,技工,曾在书铺工作,精于装订,于1948年4月至静心斋。因其人事关系始终属于装订室,故郭文未述及。

② 1947年1月17日,平馆趁教育部视察专员到馆之际,函恳代陈教育部长朱家骅“本馆目前需要事项”云:“本馆经常费,在事变前向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給,由大部拨发者,为数甚微。二十七、八两年,每年仅领两万元,而大部历年对于附属机关之改订,均系按成增加,以致本馆之经常费数目甚低,殊感不敷支配。以与中央图书馆相衡,实觉远逊,且中央图书馆屡次申请临时费以资调剂。本馆近承大部拨发追加复员费一亿六千万元,对于增购设备,补助甚巨。惟以物价高涨,事业增加,即购置书架一项,已需一亿馀元。”(《呈教育部视察在员馆内情况》,国图档,1947-※002-概况2-001)

③ 国民政府尤其是教育部,在1928年迁都南京后,竭力扶持中央图书馆,对于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却有意无意的进行抑制。参笔者《中央图书馆的成立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困境及其纾解——以抗战为中心》一文(《清代藏书史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305-329页)。

战事虽属空前浩劫,而实为我国家与民族史上最光荣之一页。窃查欧美各国对于其国家重要战争,往往搜集资料,勒为专书;或更设博物馆及文献馆,以垂永久。今本会搜集鸿富,计画缜密,颇与欧美人用意相仿佛,今若听其停顿,殊为可惜。拟即继续进行,期以五年,愿藏厥事。兹恳大部自卅六年十月起仍准继续原案,按月拨给专款四千万元,俾利进行。

其中“本会遂尔停顿,只能将已搜集之资料派员保管,无法继续进行”之语,恰与郭吾真所忆相合。这次请款,史料会搬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等“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委员”(实际上除了袁、姚,其他人均非)联署,这也是1946至1949年间史料会为自身业务赓续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次努力。

这次呈文应该取得了一定效果,教育部于此后每半年拨款1亿元^①,月均1700万,尚不及请款数之半。半年之后的1948年7月31日,预算已经“暴涨”到半年8亿,合月均1.3亿。这动辄上亿的“巨额”经费,与1939年史料会初创时几百、几千元的预算数额相比,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与此同时,因三校及平馆名额已满,史料会特向教育部申请史料会专门职员名额六名,“以专责成而便考核”^②。

至于抗战主题热度的消退,在1949年以后的两年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放在后文统一分析。

(二)

当然,若说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史料会的工作毫无进展,也显非事实。1948年7月编写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概况》^③虽属为向教育部索取经费而作^④,却对史料会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详尽的描述,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

这份《概况》,分为“成立经过”、“搜集工作”、“编辑工作”、“索引工作”四

①《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概况》(1948年6月)草稿,见于“集中保管原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资料文件(国图档,1950-&406-039-5)”。

②电子档名:本馆与西南联大合组征集中日战争史料事(国图档,1939-※054-综合2-001)。

③电子档名:本馆与西南联大合组征辑中日战争史料事(国图档,1939-※054-综合2-001)。今按:此《概况》正式稿另有毛笔草稿一份,在“集中保管原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资料文件(国图档,1950-&406-039-5)”中。因草稿中有一些重要但为正式稿删去的内容,本节将二者一并讨论,凡属草稿特有者,皆加六角括号。

④1948年7月31日平馆呈教育部公函中,曾云“兹将本会工作概况编造完竣,并于本会成立经过以及搜集、编辑、索引各项工作分别说明,特检奉一册,敬请察阅”。

大部分,“组织机构”仅草稿有。

“成立经过”部分,与本文首段介绍内容相似,此不赘述。

“组织机构”为草稿独有的内容,首次详细披露史料会的组织架构。第一层级为主席(袁同礼)、副主席(冯友兰)。第二层级有三部分,分别为总编辑(副总编辑),典藏部,总务部。第三层级中,总编辑下辖编辑部、索引部,典藏部下辖采访、编目、出纳三部分,总务部下辖文书、会计、庶务三部分。这种架构体现了平馆负责征集、保存和日常事务,联大负责编辑和整理的分工,使我们对史料会的工作情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搜集工作”主要介绍史料会各项资料的来源及数量^①。这一部分颇有价值的内容,在于详细描述了各类资料在静心斋的安置及其来源:

一曰抗战资料室。在镜清斋东正厅,所有资料大部来自昆明。采择范围,除直接与抗战有关者外,八年期间,内地文献,大体具备。^②

……

二曰敌伪资料室,在镜清斋西正厅,所藏资料可分中文、日文两种。日文书来源有三:一为来自昆明者,本会在昆明期间,由港、沪、平、津等地采访日文资料……二为来自〔北平太庙者,此即北平图书馆得自〕日本图书保存会者,由北平图书馆择其与抗战有关者,移交本会整理……三为北平图书馆旧藏及私人赠送者^③……中文书全部为北平图书馆所藏及北平图书馆接收伪组织机关者,大体皆属伪官书。^④……

三曰抗战期刊室,在抱素书屋,全部资料来自昆明。别为五类:一曰期刊及公报……二曰密件期刊……三曰零页日刊……四曰剪报……五曰索引卡片。^⑤……

四曰抗战日报室,在韵琴斋,全部系由昆明运来。^⑥……

①史料会各项资料的种类和数量,拟于后文将战后各时期资料数量加以比较并探讨,此处从略。

②包括总记、军事、后方、政经、社会、史传、方輿、文艺、敌伪(我方关于敌伪之文字)、国际十类中文资料。此外尚有地图、照片、传单、标语、壁画、纪念品若干以及英、法、德、意文书籍百餘册。

③包括总记、军事、敌情、政经、伪政权、史传、东亚、文艺、中国、国际十类日文资料。

④包括伪南京政权(伪维新政府及大民会、伪汪政权及国民党、伪南京治下各省市)、伪华北政权(伪新民会、伪临时政府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治下各省市、伪冀东政权)、伪满蒙政权(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内容含总论及原理、行政及法规、教育及文化、经济及建设、治安及军事、人事及概况、档案及章则、调查及报告、宣传及小册、杂著十类中文资料。

⑤其中剪报与索引多为昆明时期完成。

⑥除国内报纸外,尚有海外华侨所办中文报纸。

五曰敌伪期刊室,在罨画轩,此间资料,大部来自北平图书馆。别为五类:一曰伪期刊……二曰伪公报……三曰伪画报……四曰日文期刊……五曰日本画报。……

六曰敌伪日报室,在罨画轩东房内,此项日报,来自昆明者,约居四之一;来自北平图书馆者,约居四之三。……

“编辑工作”是“暂以日报为主要根据资料,剪裁贴册后,采编年体,按日排比,然后再广征一切官书公牍及私家记述,加以抉择补充,俾成有系统而切实之纪载”。包括《中日战事史料前编》(分“九一八事变”“国联动态”“热河沦陷”等20多个子目)、《中日战事史料汇编》(分“平津撤守”“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策应缅战”等50多个子目)^①、《中日战事史料统载》^②、《昭忠录》(为抗战忠烈立传以为褒扬)、《中日关系书籍提要》、《中日关系书籍简目》、《西文中日关系书籍简目》、《战时中国国际关系史料汇编》、剪报(有编年与分类两种)等九类,以及战时分别刊登于昆明、重庆《中央日报》的“敌情”副刊和“敌伪资料”副刊。

“索引工作”包括《中日战事论文索引》《中日战事史料索引》《西文期刊中日战事论文索引》《中国问题论文索引》《日本问题论文索引》《中日战事公牍索引》等。

这份《概况》,可见史料会诸公(尤其是作为实际主持者的姚从吾先生)气魄之宏大、构思之精密、征辑之勤勉,可以说为后世类似的史料征辑活动树一高标,其通盘方案,至今仍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三)

大约仍是为了扩大影响以利维持,1948年5月16日,史料会在北平(具体地点未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展览,中央社曾予报道,并获得多家媒体转载,其内容如下:

中日战事史料在北平举行展览

袁同礼报告从事征辑经过

【北平十七日中央社电】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十六日展览中日战史,分抗战资料、敌伪资料、战时期刊及剪报、战时日报、敌伪期刊、敌伪日报等项,共万五千餘件。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称:此种史料,为国内仅有之一份,展览会中对各次战役及游击战均有系统的陈列,将忠勇烈士传与汉奸传并陈,尤足以表忠惩奸。而向胡适校长借展之中美交涉照片,尤属珍贵,

①《前编》及《汇编》采《三朝北盟汇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例,兼采编年及纪事本末体,各子目可单行,亦可组成丛编。

②仿《资治通鉴》目录之例,与《前编》《汇编》相辅并行。

其中有罗斯福总统亲笔字迹,胡氏注云:“这是美《星报》的漫画之一,罗斯福总统用铅笔签名说,可以寄给蒋委员长看看。十一日后,就是珍珠港事件了。”此漫画用意在讽刺日本人在玩危险的把戏,系罗斯福总统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见胡氏时,当面交给者。袁同礼馆长于茶会中,报告征辑会乃由北平图书馆及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于抗战第二年在长沙成立,姚从吾、冯友兰两教授先后负责。九年以来,从未间断,现仍继续征辑中,并呼吁全国各界割爱赠予,以广史乘。^①

这篇报道中所记罗斯福赠与胡适先生亲笔签名之漫画,并请转交蒋介石之事,旁涉珍珠港事件,颇富史料价值。只是文末转述袁同礼讲话,称史料会“于抗战第二年在长沙成立,姚从吾、冯友兰两教授先后负责”,则两句皆错。

实际上,史料会自认的成立时间(及当时的会址)是1939年1月1日于昆明柿花巷22号(同时亦是平馆昆明办事处)。公开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工作报告(二十八年一月至四月)》(1939)、《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集刊》(1940)均明确史料会正式成立的时间为1939年1月1日。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工作报告(二十八年一月至四月)》在文末明确标注“本会通讯处:昆明柿花巷二十二号”。至于一般论著中(包括戚志芬先生的回忆文章)所云昆明大西门外地坛,则系1940年为避敌机轰炸而疏散迁移的新会址。《集刊》中姚从吾《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搜集计划书》的《附记》中,更明确说“本会因防备空袭,又从柿花巷迁至近郊大西门外地坛”。

至于长沙之说,虽非事实,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并有多位时人的“证言”^②。1937年9月三校迁湘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姚从吾等即有搜集战事史料之举。1937—1938学年,雷海宗、姚从吾等曾为长沙临大文学院、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社会历史学系三、四年级学生开设“战史资料收集试习”选修

^①此据《革命日报》,1948年5月18日第2版。今按:此新闻有多家报纸据中央社电转载,多有裁剪并自拟标题。如《贵州商报》18日第2版副标题改作“搜罗宏富现仍继续征辑中”。《新疆日报》18日第1版标题云:“平展览中日战史 包括各种抗战及敌伪资料。”《西北文化日报》18日1版标题云:“中日战史 在平展览。”《天津工商日报》18日第1版标题云:“勿忘国难 中日战史在平展览。”

^②吴相湘《三生有幸·自序》(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自序》第3页)、平馆前辈赵其康《北京图书馆变迁纪略》(《文史资料选编》第32辑,第267页)、后文所引1949年8月25日王重民的会议发言均称在长沙时期即成立史料会。

课^①。临大与平馆合组之图书馆亦着手开展包括编制索引、完成剪报、编辑国际舆论丛刊等在内的战事史料征辑工作^②。

此外,冯友兰(副主席)和姚从吾(总编辑)同时在会,且工作以姚为主导,冯之作用如袁同礼,主要作为各自机构的最高代表,不时到会视察。大约因此时姚从吾已赴任河南大学校长,故称“先后负责”。战后,史料会以平馆代管为主,代表北大、清华(如郭吾真所忆的雷海宗?)校方的联络人不详。

笔者以为,前引报道中的这两处错误非记者所能编造,当是袁同礼馆长原话,也反映出他作为把握宏观的史料会主席,对于会务细节,并不了然。有意思的是,报道中“九年以来,从未间断”之语,却符合事实(1939年1月至1948年5月,约九年半);而前引1946年6月姚从吾致朱家骅函,亦称“历时九年,幸未一日中断”,亦非虚语(1937年9月至1946年6月,约九年),反映了史料会和姚从吾从各自角度认知的史料征辑活动的历史。

(四)

1949年1月,就在平馆即将被接管的前夕,平馆曾做过一次全馆书籍统计,这也是史料会文献的最后一次分类详细统计^③。我们不妨将战后几次详细程度不同的文献数据披露加以比较(详见表1),以检讨其成绩与遗憾。

表1 1948年6月至1949年1月史料会文献统计表

统计时间 文献类别与数量	1948年6月 ^④		1948年8月 ^⑤	1949年1月
中文书	5724册	8389册	11056册	8389册
伪中文书	2665册			
日文书	2411册	2529册		2411册
西文书	118册			256册

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第121页、第136页。据1940年6月《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集刊》(第18页),其后“长沙临时大学战史资料征集班”搜集的部分报纸资料转入史料会。

②1938年2月《长沙临大图书馆馆务报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经费、校舍、设备卷》,第284-285页。

③电子档名:馆善本书种数册数(国图档,1947-※037-采藏9-007)。

④电子档名:本馆与西南联大合组征辑中日战争史料事(国图档,1939-※054-综合2-001)。

⑤电子档名: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统计概数(国图档,1948-※038-采藏10)。今按此档无具体年月,据其档号及“人事统计简表(国图档,1949-&057-008-1-1-004)”中1948年8月《国立北京图书馆藏书统计表》系于8月。

中文期刊	18800册	约33315册 (另零页 日刊149种)	33355册	30366册
密件期刊	751册			
零页日刊	149种			
伪中文期刊	3532册			
伪公报	6575册			
伪中文画报	588册			
日文杂志	2683册			2989册
日文画报	306册			
西文期刊	装订中			
中文日报	295种	337种	1879册	337种
伪中文报	42种			
华侨中文报	38种			
通讯稿	3种			
日文报	11种			
西文报纸	装订中			
地图	67 帧+11 帧=78 帧 ^①	761 张	761 张	78 帧
照片	658 张+25 张=683 张 ^②			683 张
传单、标语、纪念品	144 件+41 幅+604 件=789 件 ^③		1802 册(含公报)	748 件
壁画				
剪报	11 文卷柜			11 柜
索引卡片	30000 餘张			
合计			48853 册	

仔细比较半年时间中三个时间点的数据,考虑到统计口径和统计错漏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史料会的资料,在1948年6月之后几无变化。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史料会工作在其后停滞,仅限于维持。第二,1948年8月与1949年1月的统计,仅是从数据到数据,事实上并未对文献进行清点。或者两种可能其实属于同一逻辑之内——工作停滞以致数据无变化,是以没有再实际清点的必要。

①计抗战资料室地图67帧,敌伪资料室地图11帧。

②计抗战资料室照片658张,敌伪资料室照片25张。

③计抗战资料室传单、壁画、纪念品等144件;敌伪资料室壁画41幅,传单、标语、纪念品604件。

三、1949年2月至1951年11月:业消歇,事空图

1948年12月21日晨,馆长袁同礼奉命离平,辗转赴美,终身再未回到他呕心沥血二十馀年的北平图书馆^①。1949年1月,姚从吾离开大陆,赴台湾定居^②。1949年2月13日,北平图书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于9月27日改称国立北京图书馆^③。此后两三年间,随着社会的剧变,北京图书馆亦发生巨大变化。史料会作为前代的遗产,进一步由为人淡忘而变为“包袱”和“病赘”,先是在1950年的改革酝酿中休眠,最后在1951年11月的北图新机构中悄然隐退,不复存在。

(一)

解放初(1949年3月),史料会的编制人数为5人,其中干事2人,书记2人,工友1人^④。但我们可确知者仅关振泽一人。1949年4月中旬^⑤,苏春暄自太庙日文书库调往史料会,成为另一位史料会人员。苏春暄(1904-1950.11.21),安徽寿县人,高中学历,曾在上海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所办的孔德图书馆工作。入平馆后,先后在善本及舆图阅览室、太庙日文书库工作^⑥。

在1949年的部分时刻,史料会仍然显示其特殊价值。

1949年7月7日,平馆举办抗日战争史料展览会,自该日12时至12日下午

①1948年12月20日,袁同礼致同人信称:“同人公鉴:同礼奉中央来电,入京述职,在离平期间内,馆务由王重民先生代理,亦经部中核准。”王重民在次日致全馆同人信中说:“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狠(很)惆怅。”电子档名:王重民转袁同礼致同人的函(国图档:1948-※002-概况2-001)。今按,袁同礼与梅贻琦、李书华同机离平,实在21日(李书华:《追忆袁守和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8卷第2期,1966年,第33页)。

②据《姚从吾先生年谱》(第129页),1948年6月,开封解放,姚从吾乔装逃离河南大学。12月,在南京卸任河南大学校长,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49年1月,姚从吾押运故宫文献馆文物至台湾。

③《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1909-2009》,第38、第40页。

④电子档名:北图现有人员人数表(国图档,1950-&247-027-1-4-013)。其中《国立北京图书馆解放后最初编制人数表(1949.3)》记录了以上人数。

⑤今按:苏春暄调往史料会工作的时间,据“馆内人事任职表(国图档,1949-&251-027-2-1-007)”,1949年4月6日,代理馆长王重民曾“交单”文书股,“苏春暄调往北海静心斋办事”,但不知何故,此调令又被圈去,且不见于同日所发通知中。据“北平图书馆民主评定职工薪级自报书(式一)(国图档,1949-&255-027-4-1-006)”6月23日苏春暄自报书,其已在史料会工作两个月零十天,逆推之,其调会时间当在4月中旬。

⑥电子档名:北平图书馆民主评定职工薪级自报书(式一)(国图档,1949-&255-027-4-1-006)、送一月份工作人员变动表二份(国图档,1950-&252-027-2-2-005)。

午6时闭幕,参观并签名者达2119人。14日,“为推广展览效用,应清华大学之邀,作巡回展览,至十六日闭幕。三日中,无时不患人满,甚得好评”。9月10日,抗日史料展览再次开幕(与《赵城金藏》展览同时举办),至28日闭幕,期间接待个人观众4063人,团体观众5577人,共计9640人^①,显然颇受欢迎。

不过,这次展览会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9月16日(据档案中所云“上礼拜五”推测),恰有三位“苏联同志”来馆参观,“所得印象颇佳,惟指出三点,请馆方注意”^②。9月18日(周日)晚,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驻馆联络员李枫转达了钱俊瑞主任、王冶秋处长转来的“苏联同志”的意见,次日馆方即回复该三点意见,其中与史料会相关的后两点意见称:

(二)静心斋史料会所存史料,为一九四〇——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所搜集者,一九四〇年以后,又加入若干敌伪资料。即如“斯大林掐死中国”之画片,特为数百件中之一件。该处所存此类敌伪反动史料,纯属专藏性质,向未公开□□□□□□(今按:此处档案缺损)附带陈明。(三)抗日史料展览会场有廿八年及卅四年《中苏友好条约》两件,因陈列品太多,不甚显明,拟即加以重新布置,籍引参观人士注意。

据此可知对方所质疑的后两个问题,均与史料会有关:一为该会征辑的日人所绘画片丑化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斯大林,挑拨中苏关系,竟予展出;二为未展出标志苏联对华友好的1939年、1945年《中苏友好条约》(实际已展出)。虽然北图呈复华北高教会的公文写得平淡冲和,称“经本馆检讨后,以为此三项正为本馆平素所注意之事,以后自当更加勉励”,大有变坏事为好事之妙,但公文背后馆方的紧张与忐忑,可以想见。

当然,在整个1949年,史料会仍作为北图的一个正式部门存在,在定期召开的各部门负责人馆务讨论会议中,在上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高教会)、文化部文物局的各类文件里,不时可以看到与史料会有关的文字。

9月19日,在北图各股负责人会议中,王树伟^③发言称:“中日战史征集会

①电子档名:北平图书馆被接管后大事年表(国图档,1949-※002-概况2-002)、北平图书馆被接管后大事表(国图档,1949-&028-005-2-1-002)、人事统计简表(国图档,1949-&057-008-1-1-004)。

②电子档名:呈高教会批示(1)俄文研究会(2)静心斋史料会(3)抗日史料展览会(国图档,1949-&032-006-1-2-001)。

③王树伟(1910-1993),河北宛平人,1929年10月入北平图书馆,1973年离休,曾任中文编目组组长、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主任(今按,原档如此)、参考咨询股股长、馆长室秘书、秘书科科长、联合目录组组长、参考书目组组长、图书馆科学与方法辅导组组长等职,长期从事中文编目、线装书整理、图书馆业务辅导工作。电子档名:王树伟同志生平(国图档,1993-#362-027-6-001)。

现在除进行编目工作外,尚照料阅览事宜。本会报纸发现鼠咬现象,同时建筑潮湿,应赶快设法。”^①此时王树伟已调往史料会负责,会同苏春暄处理会务,关振泽或已离会。

10月31日,北图向高教会呈送组织人事及明年度需要增加人事说明书^②,在“现有组织”中,史料会有“编目员一人,助理员一人,工友二人,掌理中国抗战史料及敌伪资料之调查、整理、编目、保管、阅览事项”。在“一九五〇年度业务开展计划及需要增加人事”中称“现在史料会实际仅有职员二人,工友二人,装订工人一人,而照顾阅览、整理、编目,实感不够。如求发展,尚须增加职员 人”^③。

11月中旬,上呈文化部文物局《国立北京图书馆现在组织系统掌理事项人员分配及一九五〇年度配合业务发展需要增加人事说明书》中,还计划增加史料会工作人员:“现有职工四人,照顾阅览、编目,实感不够,如求发展,尚须增加。拟增加助理员二人,练习生一人。助理员每人平均月薪四百斤,二人全年九千六百斤。练习生月薪二百七十斤,全年三二四〇斤。”^④当然,这一计划在后来并未实现。

11月25日,各股负责人会议讨论史料会提出的“静心斋资料阅览及整理问题”,理由是“静心斋人少事繁,照料阅览十分困难,希望设法解决。整理问题亦属迫不及待”,讨论结果:“静心斋阅览部分工作,由快雪堂分馆协商拨人,随时协助照料。整理问题与期刊一并处理。”^⑤12月30日,静心斋阅览问题获解决,暂调黄焕霖到馆服务^⑥。

整体看来,史料会的工作仍在进行,而且似乎还有增加人员之望。不过,1949年8月25日下午召开的各股负责人会议在关于史料会的讨论中,会议主席、时任代理馆长王重民的发言和众人讨论的结果,又透露出一种不祥的

①电子档名:北平图书馆第2次各股负责人会记录(国图档,1949-&188-010-4-1-003)。

②电子档名:北图1950年人事工作说明(国图档,1949-&251-027-2-1-032)。

③此处人员数原缺。史料会当时的两位职员当为王树伟、苏春暄,装订工为任延熙。

④电子档名:北图人事分配情况及1950年增加人员的情况说明(国图档,1949-&251-027-2-1-035)。今按:此档后由北图呈文化部文物局,其呈文拟稿时间为1949年11月16日,故暂系本《说明书》时间于11月中旬。

⑤电子档名:北平图书馆第4次各股负责人会记录(国图档,1949-&188-010-4-1-005)。

⑥电子档名:本馆第5次负责人会记录(国图档,1950-&188-010-4-1-001)。黄焕霖生平资料未见,根据“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84%95%E9%9C%96/6264481?fr=aladdin),其生于1929年11月,原北京图书馆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感光研究会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缩微摄影技术协会荣誉会员。长期从事文献复制和缩微摄影工作,曾参与编写《缩微摄影技术概论》。其研究成果“便携式缩微高温胶片洗片机”曾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意味:

主席报告:除官书的问题以外,尚有史料会。史料会初创于抗战初期的长沙,由西南联大与本馆合办。三十四年以后,在实际上其全部事务几由本馆负责,南开声明放弃,清华并拒绝签字,已形同本馆一附设机关。在今天精简节约的口号下,我们不应再背负这个包袱,拟与官书同样办理,由编目股统筹处理,或将静心斋改为专门日报的一部门。

讨论结果:俟昆明存书运平,再谋全盘处理。其编目事宜,统由中文编目股负责,不应分歧。至于尚未统一者,应尽量谋求协调,俾补救缺点。

舆图部门同样如此。至俄文与日文书应如何分类,留待以后讨论。^①

在上报文物局的呈文中,则将这一讨论总结为“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及北海分馆应酌予归并”。

在将史料会视作平馆内的一个“不应背负的包袱”的背景下,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俟昆明存书运平,再谋全盘处理”,更像一个“缓期执行”的判决,而史料会的后运,自然也可以预见了。

(二)

进入1950年,史料会的处境开始尴尬起来。先是2月27日,文化部文物局下发物字第四九八号通知,暂调王树伟到南京“政务院留守办事处”协助整理图书档案^②,此后至本年11月下旬,史料会仅馀苏春暄料理会务。上年王树伟到会之后,颇想有所作为,甚至准备增加史料会的人手,但这次借调中断了这些努力。此时的史料会,在编制上尚有四人,其中编目员王树伟,负领导、编目之责;助理员苏春暄,负照应阅览、整理、对馆内联系之责。此外尚有工友两人,孔宪雍负责静心斋室内外清洁工作,照应茶炉、门户、传达、电话;刘贵荣工作同前,并经常往馆接洽事务。另有技工任延熙,负责静心斋的报纸装订,人事关系在装订室^③。至1951年史料会结束时,苏春暄已去世,仅剩王树伟、刘贵荣、任延熙三人^④。

1950年4月10—16日,北图进行了二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馆藏书大清点活动,各部门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文献清点和房屋打扫^⑤。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包括香港、重庆、昆明、美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中日战事史料征集

①电子档名:北平图书馆各股负责人会记录(国图档,1949-&188-010-4-1-002)。

②电子档名:暂调王树伟到南京整理图书事(国图档,1950-&252-027-2-2-011)。

③电子档名:北图集体分工表(国图档,1950-&247-027-1-4-004)。

④电子档名:北图1950—1951人数表(国图档,1950-&247-027-1-4-010)、文物局关于填报组织机构表的通知(国图档,1950-&247-027-1-4-001)。

⑤电子档名:我馆1950年清点工(作)和通知、报告、总结等有关文件(国图档,1950-&024-004-3-1-002)。

会的书籍”^①。在境外或京外的藏书无法清点,静生生物调查所有产权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太庙积存的没收敌伪机关日文书籍此时已准备分配给京内外重要文化教育机构,也无法或不必清点,那么史料会藏书未经清点是何缘故?王树伟离京致使人手不足当是一个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尚不得而知。

5月至6月,北京图书馆开始酝酿参照苏联图书馆的模式进行机构改革。5月24日,北图上呈文物局四份经内部讨论但内容有异的《组织条例》草案,在部处设置上,大致的意图是正副馆长之下设秘书处及采访、编目、善本、阅览及参考研究五部,分掌业务。秘书处及五部再分设股、室、会,执行基层事务及业务工作。四份草案中,仅一份涉及史料会,将其置于“参考研究部”下。其余三份草案,或者称“参考辅导部”,或者称“参考研究部”,但均未设置史料会^②。

5月20日,北图召开各股负责人会议,会中言及机构改革,徐崇冈问“原松坡图书馆及史料会应属何部”,会议主席王重民明确回答:

史料会的问题,据南开^③、北大的意见,已愿放弃其所有权,仅清华尚待商量。俟史料会全部图书归我所有时,拟将该会取消,书籍并入本馆。^④

这是馆方首次明确表露借机构调整结束史料会的意图。

1950年6月至11月,北图先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文物局商讨结束史料会并处理其图书资料^⑤。6月5日,北图致函北大、清华,称“该会所藏书籍,为三方所有,多年悬案,迄未解决。姑不论此项材料之历史价值如何,尚须从长商榷,即自目前情况之发展上看,该会似亦无再行存在之必要,如拆散分书,何者属图书馆,何者属贵校及清华,不惟手续艰巨,抑且分裂资料,有失集中管理之道”^⑥,要求将图书资料移赠北图,如二校需要参考,自当特别予以方便。6月16日,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复函同意,但强调两点“一切有关之史料,不能分开保藏”及“清华大学与本校保留在保藏史料处所工作与参考之权利”。清华复信未见,但8月16日,北图分别致函文物局、清华大学,

①今按:清点之前,清点委员会下发的征求意见表格中有史料会这一部门。而本档中《国立北京图书馆图书统计表》附注云:“香港、上海、昆明、重庆、台湾、静生生物调查所、太庙、史料会各处书籍未列入。”

②电子档名:北图组织条例(国图档,1950-&247-027-1-4-007)。

③今按:北图多份档案均表明南开大学已声明放弃史料会文献的产权,但未见正式公文。

④电子档名:负责人汇报会记录(国图档,1951-&192-010-5-2-001)。

⑤电子档名:集中保管原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资料文件(国图档,1950-&406-039-5-1-001)。

⑥这段话较为直白,已为正式稿删去,但恰可反映馆方此时的心态。

称清华原则上同意移赠图书,但要求解决派在史料会的郭吾真的出路问题,以为交换。北图愿以每月六百斤小米(在清华支八百斤),聘郭吾真入中文编目组,“藉此可使史料征辑会顺利结束,不致留为病赘”^①。24日,清华复函同意。10月13日,北图呈文文物局,汇报处理经过。11月2日,文物局图书馆处电话告知北图此事已批准备案。8日,北图向北大、清华通报最终结果,文中称“今后该处图书,即由我馆所有,但仍继续给予贵校以参考使用上的便利”,随即引起北大的注意。13日,北大函北图,对“即由我馆所有”一句提出质疑,认为与最初共识不符。16日,北图函北大,解释称史料会图书系由北图“永久保管”,文物局备案文件即如此界定,此事终告结束。

此次交涉,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仍当溯源1946年1月23日联大第三六一次常委会议的决议。那次会议提出的由平馆继续征辑并专设部门保管史料,且为三校同人研究提供便利的“接收办理”条件,为各方所遵守。虽然在史料产权方面模糊处理,留下了一个尾巴,但仍奠定了史料会问题最终解决的基础。

(三)

就在与北大、清华协商结束史料会之时,1950年7月4日,北图方面仍打算“今后并拟将一切不公开材料送存静心斋,成为一个专藏”^②。不料,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7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忽然致函北图,称静心斋景色优美,为北海名胜之精华,“为符合群众企望,请将你馆借用之北海静心斋房屋虑予迁让,以便整理开放”^③。8月8日,平馆呈文文物局,诉称“我馆在静心斋储存敌伪资料、出版品及特藏图书,为数甚多,目前值我馆房舍不敷使用时,该处房屋正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一旦交还,此批图书势必无法处理。固然,过去该处一向闭为禁地,并不自我馆始,而且今天也应开放,但我馆房荒问题迫在眉睫,如无法解决,则仍属徒托空言,不能见诸事实。即或有房可迁,而一笔迁移费为数又复不少”,要求文物局代为疏通。经过园、馆沟通,9月17日,北海公园致函平馆,称平馆在未迁让之前,应将静心斋先行整顿开放,“以符广大群众要求”。10月9日,北图呈文文物局,称静心斋保存重要史料,“如必欲徇游赏之乐,而置国家文物于不顾,静心斋地处偏僻,建筑及路径又多隐蔽曲折,值兹加强保卫工作时期,绝非三五园丁所能胜任。我馆人力有限,亦难照料周全,脱有不测,谁任其咎?”请求文物局予以力争,以求万全。

不过,就在园、馆交涉胶着之际,静心斋又迎来了新的竞争者——也是一

①此句为正式稿删去。

②电子档名:第10次负责人会记录(国图档,1950-&188-010-4-1-012)。

③电子档名:北京市府关于北图归还静心斋的文件(国图档,1950-&219-013-1-002)。

本节关于迁移静心斋藏书的文字,除特别注明外,皆据该档。

位无法拒绝的竞争者——中央文史研究馆^①。11月22日,文物局致函代理馆长王重民,介绍政务院中央文史馆王啸竹来访,“面谈关于静心斋的使用及搬运藏书的一些具体的问题”。24日北图负责人会议上,则明确报告“政务院成立一文史研究馆,拟用静心斋为馆址,希望我馆原有各部门书报移存故宫……此项迁移费用由政务院担任”。此事已无可商量,而且文史馆也替北图解决了搬迁地点和经费两大难题。回溯文物局、故宫、北图之间关于文史馆址的博弈,则大致是1950年11月8日,郑振铎约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及总务处处长张景华谈话,有意将馆址设于故宫,“经再三拒绝,始择定北海静心斋为其馆址”。交换的条件是“故宫能腾出房屋,俾北京图书馆迁储,则此事即可解决”^②。

既然无可挽回,馆方遂顺水推舟,欲借此次迁移机会对馆藏布局进行调整,使原本紧张的藏书空间变得宽裕一些:“即拟将特藏股及史料会书刊移入总馆,日文期刊移庆霄楼(按今在北海),而以原庆霄楼之梁任公遗书和总馆复本书、暂时不能处理的书移入故宫,留出大书库部分地方容纳五一、五二年新编的十八万册书。”^③11月28日,北图已拟好迁移静心斋书报及家具所需各类经费,由王啸竹转交文史馆。根据北图1951年2月20日呈文物局文,之后“数度联系的结果,该馆(今按指文史馆)决定占用静心斋东半部,即自镜清斋以东完全让予该馆,仅余叠翠楼西部平房仍由我馆使用^④。因此我馆全部图书均须移动,其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原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各种书刊及特藏书籍,拟乘此次移动,迁回总馆,以利阅览,复便于集中保管”。经过协调,至1951年3月1日,文史馆支付迁移费用三千万元,北图于2日开始迁移。同时,经文物局向故宫交涉,商借景山寿皇殿存放自文津街北图总馆迁出之约八百箱图书及部分家具。12日下午二时,北图韩承铎等与政务院代表尤戟门、王啸竹在静心斋办理交接手续,文物局崔叔青、北海公园石岫岩作为见证人。至此,静心斋迁移之事得到解决,史料会文献全部迁回总馆,而北海公园整理开放静心斋的计划,也不了了之。

当时静心斋所藏书籍,包括图书史料7.5万册、报纸1.3万册、日文期刊2.2万册、日本大使馆档案2700册、特藏书(蒙文文献)2.3万册、本馆出版品7万册,共计20.57万册。其中大致可以确定为史料会文献者约11万册,大约是1949年初(约4.8万册)的两倍多。可见1949年后因国家局面稳定,北图地

①中央文史研究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倡导和关心下成立的,直属政务院。

②吴空:《从〈马衡日记〉中看中央文史研究馆选址》,《世纪》2011年第4期,第75页。

③电子档名:第14次负责人会记录(国图档,1950-&188-010-4-1-016)。

④今按:静心斋中心建筑为镜清斋,主要建筑(包括史料会图书)均在东侧。

位提升,经费有所保障,藏书激增,史料会虽日渐边缘化,但“大河有水小河满”,其收藏却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

在1950年岁末,史料会又发生了不幸。11月初,助理员苏春暄因感冒致疾,后转肺炎及心脏病,于21日不幸去世,葬于北京市广安门外安徽义园村。馆方念其在馆服务二十年之劬劳,特请示文物局,发给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明书及棺葬费、抚恤费共1200市斤^①。27日,北图呈文文物局,称因苏春暄病故,“该处即无人照管,影响颇大”,请求将王树伟自南京调回。但实际上,史料会已即将结束,王树伟回京之事并不迫切。他本人似也愿意继续留在南京,先后为“政务院留宁办事处”和“中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借调,又替北图在宁征集部分官书及古籍,直至1951年8月左右才得以北返,此时史料会已形同虚设。王树伟回京后,每日半天,协助中央民族学院创建图书馆;又于1951年11月应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兼主任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之邀,往该处协助整理图书^②。

1951年11月8日,北图新的暂行组织机构及人事配备为文化部文物局批准,其中已无“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这一组织(王树伟调任馆长办公室代理秘书)^③,史料会在形式上正式结束。

四、结语

1952年5月24日成文的《北京图书馆文书股移交清册》^④中,记录了与史料会有关的众多文件和物品信息:

第一部分 解放前

.....

(二)关防印章

18.“中日战事^⑤史料征辑会”木质小方章一颗

.....

第二部分 解放后

.....

①电子档名:苏春暄病故的报告(国图档,1950-&258-027-6-005)。

②电子档名:暂调王树伟到南京整理图书事(国图档,1950-&252-027-2-2-011)。

③电子档名:文物局关于北图组织机构和股以上人员配备的批复(国图档,1951-&250-027-1-5-002)。

④电子档名:北图文书股移交清册(国图档,1952-&238-026-4-001)。

⑤今按:“事”原档作“战”字,误。又《王树伟移交档案的报告及清册》(国图藏档:1957-&238-026-4-001)档中王氏移交印章中亦有“‘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木质小方章1个”的记录。

八、“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目录

- 125. 各种期刊单子 一捆^①
- 126. 图书目录 三册(一号——五六二五号)
- 127. 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购买登记簿 二册
- 128. 西南各种日报目录 一册
- 129. 剪报目录 一册
- 130. 史料会卅五年装箱总表 一册
- 131. 史料会报纸存目 四份(每份廿五页,未装订)
- 132. 史料会装箱单 五册
- 133. 史料会送往本馆书报底账 一夹
- 134. 本馆送往史料会书报底账 一夹
- 135. 各种戳记 十七颗

史料会文献迁回文津街总馆后,起初仍集中保存,但最终仍未能避免散入书海之命运,其历程如何,俟考。我们推断,史料会的数万册书、报、刊目前大约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典藏阅览部和古籍馆(新善本)^②,仍有待仔细地清理。而大量精心编制的长编(数十种)、剪报(11柜)、索引(3万馀张)及移交清册中的各类目录及底账,今日仍未知所在。

纵观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的后期档案,我们发现,史料会并未因战事的结束、联大的结束而随之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对战事史料的进一步征集、编辑与出版,乃至据此撰写一部或几部不同角度的史书,本应是和平到来之后理所当行之事——然而,1946至1950年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直至1951年底始正式结束的史料会,并未尽如其创立者们所期,完成以上所举的各项工作。

这种遗憾的发生,表面的原因不外乎时局变化、经费不足(在解放初期这

①根据清册后相关人员说明:“125、126、128三项已于53年7月15及8月14由参考组借去。”

②在典阅部工作的李娟老师,曾撰有《袁同礼与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一批珍贵的抗战文献——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藏书发现始末记》二文(出处参前)。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即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中部分书影铃有史料会藏印,古籍馆金石组藏有“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铜制方章一颗。

一困难依然存在)、人员短缺^①,但更深刻也是更无可逆的原因,则是抗战主题热度的消退。人们总是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最感兴趣,愈久远则愈陌生,愈遗忘。即使是血痕犹在的抗战研究,与国共激战正酣,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当下”比起来,已经不是人们包括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尽职的对象。这种消退和更替,如果与同为“股”级单位的苏联研究室相比,则更加明显。早在1947年便筹备成立的苏联研究室,在1949年前比较敏感和低调,但在1949年后,却日益重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由秘书长(后任副馆长)张全新兼任领导之职,这一点是否与袁同礼以副馆长(后任馆长)兼任史料会主席有所类似?《国立北京图书馆一九五〇年下半年需要增加工作人员说明书》中对“苏联研究室”如此说明:“现有工作人员三人,内一人代理秘书长……需要积极开展工作,拟增加编目员一人,助理员二人,练习生一人。”^②1954年12月编成的《北京图书馆1953年工作概况》中,专设“苏联图书工作”一章,如此描述“苏联图书室”的盛况:“解放前馆藏俄文图书约四千餘册……解放以来,苏联图书数量激增,到一九五三年底,已达六万餘册。”^③而此时,史料会已成为“天宝末年时世妆”,早已为时人所忘。当然,时至今日,苏联研究室(包括1949年以后成立的新文化阅览室等)也早已不复存在。

时间对一切事物都是公平的,繁华与冷清,往往只是一线之隔,但价值却不易磨灭。我们衷心期待着这份前贤在板荡流离、多难殷忧中为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能够早日拂去蒙尘,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简介】刘鹏,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藏书史、图书馆史。

①北图在解放初的阶段,人手十分短缺,编制严重不满。1950年8月4日北图第十一次负责人会议中,曾专门讨论人事问题:“各部门需要人员都十分急迫。根据政务院的统一规定,本年毕业大学生分派到各机关。原来我馆提请分派十人,因限于文物局提出的条件,所以可能只有两个大学生分派到馆……我馆已向文物局取得联系,请予留意。不过现在到十月初这一阶段,如何渡过,确是一严重问题。”(电子档名:第11次负责人会议记录。国图档,1950-&188-010-4-1-013)该档另称北图1951年编制数232人,在编157人(不含18位临时工,2位兼任),缺编75人。

②电子档名:北图1950年下半年需要增加人员的说明书(国图档,1950-&247-027-1-4-002)。

③电子档名:1953年工作概况(北京图书馆)一本(国图档,1953-&028-005-2-1-001)。